

# 卫拉特蒙古射箭运动及其传承保护

锋 晖\*

(新疆师范大学法学院 乌鲁木齐 830054)

[内容提要] 卫拉特蒙古射箭运动及弓箭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和崇高的人文精神,构成了卫拉特蒙古人战胜困难、顽强拼搏的精神支柱,对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直至今日挖掘和弘扬这一文化对于卫拉特蒙古文化发展具有着积极的影响。本文系统阐述其射箭运动的历史发展和文化内容,并针对濒危现状提出传承保护模式的构想。

[关键词] 卫拉特蒙古 弓箭文化 传承保护

[中图分类号] G8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067(2014) 03-0064-07

弓箭文化是蒙古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和崇高的人文精神,渗透在政治、经济、礼仪、教育、军事、民俗、科技等诸多民族文化领域。军事学家中有一句名言:“凡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草原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草原民族游牧和射猎的生活方式,使得弓箭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既是射猎生产工具,又是军事作战武器,更是渗入生活的重要文化形式,射箭运动也在卫拉特蒙古长期社会历史生活的酝酿下形成了独特的卫拉特蒙古弓箭文化。

## 一、卫拉特蒙古的形成与弓箭文化

1206 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1218 年成吉思汗派兵出征西域,南北疆皆属蒙古统治。为配合成吉思汗的西征,诸多原西域的游牧部落被融合于蒙古中,并且蒙古大草原的蒙古族也大批迁入西域,逐渐构成了西域的蒙古族。成吉思汗晚年将其辖地分与他的儿子,次子察合台管辖高昌畏吾尔境以西至河中的广大地区,三子窝阔台管辖叶密里(额敏县)以北包括阿勒泰等广大地区,蒙古部队以此为基地控制中亚,习练兵马,并对西方世界进行了三次西征,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成吉思汗在西域备战中亚的战争间隙常举行射猎活动,曾遣使召长子术赤从四方出发把猎物赶来,成吉思汗和部将军士们放马追逐射猎,在他们猎厌了之后便在猎得的野兽身上打上自己的印记放掉。指出射猎“不单是为了猎取野兽,也是为了习惯骑射锻炼,熟悉马背技艺”。认为射猎是军队将官的正当职司,从中得到教益和训练是士兵和军人应尽的义务。

诸多历史文献对卫拉特蒙古射箭运动进行了记录。但基本以民族风俗的形式被记载下来。如《西

---

\* [作者简介] 锋晖(1977—),男(锡伯族),新疆师范大学法学院副书记、新疆师范大学中亚法律资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域图志》载：准噶尔俗“每岁分为四节……春日则女子有踏鞠之戏秋月则酋长有马射之棚；长夏则亲朋有马湮之会；三冬则孩童有泼水之乐<sup>①</sup>。《厄鲁特旧俗纪闻》中也有踏鞠、马射、泼水、诈马（蒙古套马戏）等活动的记载。《新疆礼俗志》中载：“官民贞祭祀鄂博……祀毕，年壮子弟相与贯授跤驰马，以较胜负”。《新疆志略》载蒙族民俗“蒙人俗尚相扑之技及驰马等，以角胜负……每年四月，官民贞祭祀鄂博。祀毕，年壮子弟作摔跤、驰马，以角胜负。”<sup>②</sup>“蒙人尚武勇，善骑射，祭祀鄂博时……壮年子弟，相率角力赛马，胜者有奖赐。”<sup>③</sup>《清碑类钞》中也载有：“每当祀毕鄂博要驰马年青人各自选择善跑名马，集于预定之处，近则三四十里，远或百余里，准备比赛”听到开始的角声，便鞭马向鄂博疾驰，先至者谓之夺彩，奖赏分为五等，各得银币若干“会盟时要跑马会盟原名跑马大会，藉此习练马足，尽马力之所及兼程而至”事后择旷野纵髻奔驰，以角胜负“胜者，大家用红布覆马首以示区别”。摔跤也很流行，祀鄂博毕，年壮子弟都要蹬跤分东西两列，各出一人比赛，胜者必须将负者按捺于地，使负者不能挣持再起，才分胜负“胜者扶负者起，官长高座监斗，连胜十人者为上，以次至五等，分别奖赏。”<sup>④</sup>“蒙民以跑马为日常生活，无论男女孩童皆能骑乘”，每当“庙会期，凡四近之娴骑术者，必行走马赴场比赛，其控驭之精，世少伦比。”又好摔跤角力。“每于鄂博祭日为正式举行期，角者着短衣，或成袒身登场而斗，以推倒对手而胜。”蒙人又善歌舞，每当春秋晴日，晚间聚数人或数十人于屋包附近，高声歌唱，手舞足蹈<sup>⑤</sup>”《回疆通志》中也有“妇女登眺，男子驰马较射的记载”。

清朝康熙年间有蒙古准噶尔部之乱，其首领噶尔丹与沙俄以及西藏民族分裂势力联合，以伊犁为中心，攻略喀尔喀蒙古，袭击青海、西藏，侵扰哈萨克、布鲁特，成为当时清朝最大的边患，清帝多次动用重兵亲征先后历时 70 年才予剿灭。期间准噶尔部大练兵马，建立起强大的骑射部队，对清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对此清朝统治者也是以及其残酷的方式对准噶尔蒙古族众带来了灾难。据清朝文献记载，清朝在重新统一西域的过程当中采取了极为残酷的屠杀政策。据礼亲王昭桩《西域用兵始末》记载：“其他诸贼，既降复叛，自取诛灭，草藻禽称无唯类，固无论已，此固厄鲁特一大劫，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二，为我兵杀者十之五，数千里内遂无一人。苍天欲尽除之，空其地为我朝耕牧之所，故生一阿逆为祸首，辗转以至渐灭也。”赵翼在《皇朝武功纪盛》中指出：“时厄鲁特慑我兵威，虽一部有数十百户，莫敢抗者，呼其壮丁出，以次斩戮，寂无一声，骄首就死。妇孺悉驱入内地赏军，多死于途，于是厄鲁特种类尽矣。”椿园记载：“大兵分途进剿，诛杀厄鲁特男妇子女逾百万，其余窜伏于山谷中者，经官兵四出搜查诛夷尽绝，因而灭其种类”。同时对于剩余臣服的准噶尔蒙古部众进行了严格的管理，一方面通过倡导喇嘛教的精神工具弱化其尚武风尚，一方面对于其摔跤、射箭、围猎等体育项目进行了限制，使得以往大规模的传统角弓射箭活动在准噶尔蒙古中逐渐淡化，以至于角弓制造的工艺也近失传，改为单体木质弓的比赛。充分可见清朝在西北边疆地区实行的武力征服政策残酷性的一面，清朝武力征服政策对准噶尔蒙古社会生活和体育文化产生了较大的破坏。

在清朝平定准噶尔之乱后，蒙古族传统射箭运动分两种形式传承，一种是以八旗制度为依托在察哈尔蒙古八旗军民中传承，另一种形式就是以“那达慕”大会为载体在民间传承。察哈尔蒙古是平定准噶尔之乱后由东北迁移至新疆戍边的一支蒙古族军民，为清代西北国防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此对于军民的作战力有着严格的要求，军事训练由其领队大臣亲自督查，定期进行骑射考核，作到“角射而赏罚之”，每年春秋两季，蒙古族各旗牛录官兵均要在旗下档房的组织下进行骑射操练，称作“佐领阅兵”，比赛以“步箭”和“马箭”为主。要求蒙古兵士要达到一马三箭的标准。其后是一年一度的“总官阅兵”，在“佐领考试”选拔兵士中，骑射、步射均及格者才有资格到总较场试射，通过者被选为“伍克辛”即“披甲”。被选为“披甲”的家属将得到政府的俸禄地，同时还根据其戍边征战中的功绩和每年考核中的业绩而享有政府

① 傅恒：《皇舆西域图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71 页。

② 《新疆志略》，正中书局，民国三十四年，第 636 页。

③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 345 页。

④ 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1385 页。

⑤ 张步天：《中国历史文化地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年，第 862 页。

所给予的无尚的荣誉,骑射不达标者不但得不到官方的俸禄还要受到族人的申斥。这使得察哈尔蒙古的传统射箭运动在清政府“国语骑射”国策的影响下传承。

而对于非八旗军民系列的卫拉特蒙古、准噶尔蒙古等蒙古部族,传统射箭则依托“那达慕”大会的形式进行,此时“那达慕”的功能也较以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娱乐的成分逐渐增强。“那达慕”的主要内容“男儿三艺”被列为政府“朝会”和“行围”的必备项目。此外,盟旗管理制度的建立,对于“那达慕”的进一步娱乐化发展,内容的不断扩展化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出现了以本盟旗为单位举办的多种功能的“那达慕”,选拔出属于本盟旗、寺庙的著名神箭手和搏克手(摔跤手)。又借助这一聚会方式构建相邻旗县联谊、交流的平台。到了清末民初,“那达慕”增加了集市、商贸、物资交流的内容,其经济作用得以发挥和伸展,可以说是由体育活动搭起的经济文化交流平台。

由此可见,在清朝统治者的政策下,清代卫拉特蒙古因政治身份的不同,其射箭运动开展的形式和内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非八旗系列的蒙古族传统射箭主要以“那达慕”大会为主要载体不断传承,其射箭运动以娱乐和射猎生产职能为主,而八旗系列的蒙古族突出军事性,有着严格的规程,为西北国防武备国策的一部分。

## 二、清代卫拉特蒙古射箭运动的开展

### 1. 军事训练中的射箭运动

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在临战之前,每个士兵必须带60支箭,其中30支箭头较小,用作远距离发射之用,而另外比较大的30支,带有宽大的叶片。这是在逼近敌人的时候使用的,专门射敌人的脸部和手部,使敌人遭受重大的损失。当他们弓箭全部射完之后,才使用剑和锤矛,互相砍杀”。“每个战士必须带有下列武器:弓二张到三张,其中至少有一张好弓,三个装满箭的大箭筒,他们的箭有二英一掌加二指的长度,因为一英等于一指长,十六指长等于十六英。铁制的箭头极锐利,跟双宝刀相似也,两面削尖,在他们的箭筒内常就有一把磨尖箭头用的锉子。”

清代新疆蒙古八旗的训练较为严格,每年由伊犁将军府统一视察管理。要求50米处立靶,“一卒步射十矢,马射五矢,步射中七。马射中三者为上等,赏弓一矢十,白金、布帛各七;步射中五,马射中二,为中等,赏白金、布帛各五;马、步或一不中,或两俱不中,则笞之。一佐领受笞之卒过十人,则佐领有不善教练之罚,至夺俸”。<sup>①</sup>

### 2. 民俗竞技中的射箭运动

据戈尔通斯基《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记载,卫拉特蒙古每逢喜庆集会,卫拉特的军队都要进行射箭比赛。乌鲁木齐南郊的“乌拉泊”,准噶尔语“红色靶场”的意思,就是准噶尔人经常举行射箭比赛的地方。据《乌鲁木齐史话》记载,因每次比赛结束后,群众把鲜红的彩巾披在优秀射手的肩上,所以取名“乌拉泊”。历史上“弓以桑榆为杆,角取诸野牛、黄羊,胶以鹿皮为之,体制长而弱,非若六钧三石强也。矢以柳木为之,笨而大,镞以铁为之,有阔二寸或二四寸者,有似钉者,有似凿者,然阵中人不矢,矢不虚发也,弦以皮条为之,笨而耐久也,其弓弱,其矢强剌之极满至三,二十步发之,辄洞中贯胸,百不一矢,但不能射于五十步之外。”

蒙古族射箭使用的是牛角弓、皮筋弦、木制箭、铁镞,比赛距离短则15米——20米,长则百米。箭靶沿用“毡片靶”和塔形靶。弓的规格长二米三,宽四厘米,两头尖扁圆形,白色木制品,箭杆长1米左右,箭把有三排羽毛,箭杆和箭头都是木制品,杆粗一指,箭头象小孩拳头那样大,长五厘米。周围15厘米。箭靶为牛筋等皮条绕起来的拳头大小的圆球。比赛距离有10米、20米、30米。

卫拉特蒙古射箭形式主要是步射和骑射。步射一般规定,每人射4箭,分3轮射完,以中靶次数多少评定胜负。比赛时,射手身穿彩袍,脚踏马靴,裁判员一声令下,众射手盘弓搭箭,一齐射向靶心。凡

<sup>①</sup> 金德纯:《八旗军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42页。

是射中的,靶心自行脱落,观众给予热烈喝彩,最后由大会主持者一一发给奖品。骑射也是蒙古族人民所喜爱的体育活动,每逢重大节日,举行各种骑射活动。史书载“每当庙会期,凡四近之娴骑术者,必行走马赴场比赛奔走劲,高声歌唱,手舞足蹈”<sup>①</sup>清末至解放初,卫拉特蒙古射箭运动基本延续着以往的形式,但骑射项目却大大萎缩,只突出步射。其毡片靶的直径定制为1.7寸(56厘米)、0.67寸厚(2厘米)、在两层生牛皮中间夹有毡片,用骆驼皮绳缝制而成。“毡片靶”共有四环一心,四环的颜色是固定的,从外环起分别是白、天蓝、黄、绿。靶心用红色布包,叫“央眼”。射中“央眼”得5分,其它分别得4、3、2、1分。虽然射中最外边的白环,但如果其它环不脱落时不得分,脱落后得1分。比赛距离缩减至12弓至30弓的距离,在不同内容“那达慕”上都有不同形式的庆贺或奖赏方法。

总体来看清朝中后期的蒙古族,尤其是卫拉特蒙古的传统射箭运动受到清朝统治者的严格控制,必须根据清政府统治的需要规定射箭活动的规模、形式及器材的形制。到了近代,由于清政府统治系统的结题和枪支的大量使用,蒙古族传统弓箭文化中尚武和武备的内容淡化,以往打围射猎、骑射考核和武备训练的传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大规模的弓箭制造业逐渐消失,转而突出娱乐的形式,以“那达慕”大会为平台开展。

### 三、解放以来卫拉特蒙古射箭运动的发展

#### 1. 中国现代竞技射箭运动大繁荣与中国民族传统射箭的大衰退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3年起,每年都组织全国性的射箭比赛。1953年11月8日~12日,“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在天津举行,射箭项目进行了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首次比赛,分为竞赛项目、表演项目、民间体育三大类。1955年,在北京体育学院张文广教授的倡议下,该院武术专业课程中开设了射箭项目的选修课。1956年举办了全国性的射箭比赛,比赛使用传统弓箭,采用传统比赛赛制。1959年新中国第一届全运会设立射箭比赛并采用国际通用规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按照国际射箭规则比赛,共有20个队,222多名运动员参加,标志我国的射箭运动与国际射箭接轨。站在传统文化的角度上在这里要提到的一点是,竞技体育射箭项目及其他西洋体育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迅速,中华传统射箭却也是在这一时期销声匿迹。而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民族体育面临西洋体育的挑战而不得不努力转型以求得生存和发展时,许多民族体育的先贤还竭尽心力建构“国术”体系,以保存和完善民族体育的整体架构,以应对西方体育文化的挑战。射箭是当时“国术”的构成的重要部分,也是旧时代多次全运会的正式项目。新中国建立后,1953年在天津举行的民族形式体育表演比赛大会上,中国式射箭和民族传统射箭也都是比赛项目之一。其后,从1956年到1958年之间,还举行过多次全国范围的传统射箭项目比赛。但自1959年起,我国开始按照国际射箭规则举办比赛,接受了与传统弓术不同的赛制和程序,接受了质地和制作方法完全不同于中国弓的国际弓,使得我们在大力接受和推广国际射箭的同时淡化了传统射箭和民族射箭项目的传承与研究。

#### 2. 中国竞技射箭大发展背景下的卫拉特蒙古传统射箭运动

在全国现代竞技射箭大发展的社会氛围下,卫拉特蒙古射箭运动也开始分化为传统射箭和现代竞技射箭两种形式展开。1959年我国大力接受和推广国际射箭后,使现代竞技射箭运动在蒙古族中发展较为迅速,但在另一方面淡化了民族传统射箭和民族射箭项目的传承与研究,使蒙古族传统射箭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1956年10月国家体委和中央民委在天津举行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上设立过射箭表演项目,共有四支代表队的5名运动员参加了表演。自治区虽然第一次派射箭运动员参加全国性运动会,但布和敖其尔、李青、淖木拉西分别获前三名,一举成名。从1956年到1959年的三年时间内,在全国射箭比赛中有4人次获第一名,5人次获第二名,2人次获第三名。当时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sup>①</sup> 张步天:《中国历史文化地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56页。

1965 年主持新疆射箭项目的自治区体工二大队成立,至今共培养了蒙古族国家级射箭运动健将 2 名,取得 15 次全国前六名的成绩。基层射箭队中先后培养出蒙古族射箭教练 13 名,裁判 16 名,队员 89 名。在 1956 年—2008 年全疆射箭比赛中取得了 53 枚奖牌,为自治区竞技射箭运动立下了汗马功劳。

期间,卫拉特蒙古民间传统射箭依旧以“那达慕”大会为载体进行,形成“政府搭台,企业参与”的文化产业模式。博州政府在“那达慕”草原节的发展进程中,逐渐实现了角色的转变和职能的转变,从“办体育”向“管体育”的方向发展,新疆“那达慕”草原节的运作模式也从政府的完全主导,转变为企业加入的市场运作模式,此时的蒙古族的传统射箭却并没有摆脱濒危的状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比赛的赛制,由于比赛中诸多裁判均为现代竞技射箭裁判,因此“那达慕”大会中的射箭项目开始采取现代竞技体育的赛制进行,传统比赛规则逐渐受到各类的影响而废止,特别是骑射比赛;第二,器材的使用,蒙古族传统“角弓”制作对材料要求较高且制作工艺较为复杂,今日传统角弓制造技术已严重濒危,比赛弓箭基本被现代材料制造的竞技弓箭所代替,现代弓箭有着诸多瞄准仪器、平衡杆、箭台和钢片,使用方法与传统弓箭完全不同,因为器材的不同也使得器材的使用和比赛的规则等内容有着很大的差别;第三,比赛的仪式,“那达慕”活动中虽然射手身着传统服装,但是比赛中的仪式及文化内容却依照竞技体育的形式进行。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传统射箭运动的进行。在新疆各蒙古自治州每年一度的传统草原节日“那达慕”大会及喀纳斯蒙古族的后裔图瓦人中虽有射箭活动,但与传统射箭内容相比确有一定的差别,表现的既非现代也非传统的模式。实际上蒙古牧民更喜欢使用传统角弓进行娱乐比赛。但由于历史原因目前卫拉特蒙古中已经很少有人会做传统角弓,在“那达慕”大会中也已经看不见用角弓进行射箭比赛的场景,传统射箭项目逐渐被人们淡忘,在此基础上,随着传统射箭运动的濒危,卫拉特蒙古弓箭文化中的人文内容也随之淡化,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 四、卫拉特蒙古射箭运动的现状

从民族范围内来看,传统弓箭文化是蒙古族传统文化体系中最具代表的文化项目,历史十分悠久,清代在新疆蒙古八旗聚居地设有相当规模的弓箭造办处,有大批民族工匠批量生产弓箭,保证国防军备需要,民间群众性的射艺风尚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屯垦戍边军事文化,对新疆边防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今日蒙古族传统射箭和弓箭文化却严重濒危。

制造技艺的濒危:传统弓箭作为蒙古族传统弓箭文化传承的重要物质载体,有 11 道制造流程,230 道制作工序,并存在一系列严格的蒙古语工艺术语,制造工艺复杂,对传统材料要求很高,体现着冷兵器制造的最高科技水平,也是古代各民族工匠智慧的集中体现。但在今日由于弓箭失去了生产工具、作战武器的功能,同时也难以获得达到传统制弓标准的诸如牛角、牛筋、鱼胶材料等原材料,使传统弓箭制造工艺面临失传。

训练内容的濒危:蒙古族射箭训练内容已基本采用西方竞技体育的训练模式,由于自 1959 年国家体委推广西方射箭竞技体育运动项目以来,今日从整个蒙古族聚居地来看蒙古族射箭训练无论从训练内容、形式、主题到训练器材均失去了传统内容。

射艺形式的濒危:传统射艺形式被现代竞技体育形式代替,遗失传统竞技比赛的内容,自自治区体育部门组织开展现代竞技体育射箭以来,蒙古族聚居地的传统比射艺赛已消失,以爱国主义和礼仪修养为主题的传统比赛的赛制、程序、规则被以体育竞技为主题的现代西方体育内容代替,此外萨满教的射猎祭祀仪式消失,民间娱乐性的民众射艺竞技表演也已消失。

“寓教于射”的教育形式的濒危: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寓教于射”的教育形式在迅速面临濒危,射箭运动的特别之处在于其突出射手的心理素质,蒙古族认为射手只有内心意志坚定,目标专一才能练就精湛的技艺,而良好心理素质与道德修养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蒙古族十分强调射艺修行,通过射箭塑造崇高的爱国主义品质,形成稳定的射术心理,最终达到“寓教于射”的目的。但今日对这种文化教育形式缺乏必要研究、宣传和传承,甚至知之者寥寥,从而面临着消失的危险。

造成传统弓箭文化濒危的原因固然涉及历史、现实等多方面,但更多的是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关

注。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都是在中国射学影响下形成的所谓“弓道”,同样经历了近代社会的剧烈转型和西方体育文化的大规模浸入,可是日、韩两国的弓道却受到政府的重视和国人的珍爱,至今不但依然存在,而且会员众多,组织正规,习射之风浓厚,同时逐步将此以射涵养心性和道德的“弓道”推向世界各国。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相关政府部门有意识加大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特别是对中国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诸多文化爱好者热情也较为高涨,与国内外相关学者及文化人士建立平台,并进行着积极的努力,因此复兴蒙古族的传统射箭活动时机较好,前景也较为乐观。

## 五、卫拉特蒙古传统射箭运动保护模式的构建

### (一)简述日本、韩国弓箭运动的发展模式

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今日的日本和韩国传统弓箭文化保护传承状况较好,也构成了其国家“文化战略”的一部分。日本早在上个世纪初期便开始向北美和西欧输入其日本弓道文化,培养弓道射手,设立弓道馆,形成弓道文化产业、建立弓道考核制度、段位制度等,通过弓道的开展和普及推出日本文化,加至日本弓道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使日本弓道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为日本经济、政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而韩国虽然在传统射箭运动国际化道路中起步较晚,但韩国借助其国内传统射箭的群众基础,一直包揽着国际奥林匹克射箭项目强国的桂冠,近年来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韩国越来越关注其传统文化的国际化发展,将其与政治经济的国际化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以文化的力量为韩国谋取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在这种“文化战略”的政治背景下,韩国一方面在其传统文化中割断与中华文化的历史联系,杜撰历史,强调其文化独立性;另一方面努力向世界推广本国文化,以“传统文化”支撑其“民族精神”和“大国战略”。

日本弓道自1992年开始正式传入我国,在天津设立弓道馆,并逐步走入校园文化中,200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设立求真弓道馆,开始有相当一批日本弓道文化传播者进入我国大中城市。韩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成功实现跆拳道国际化道路后,也在今日努力加强韩国传统射术的国际化发展,积极向我国输入其射术文化,实现文化输入和经济产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使我国已经处于濒危的国术射艺文化进一步受到冲击。

### (二)蒙古族传统射箭运动保护模式的构建

通过对日本、韩国传统弓道文化发展模式的调查研究,结合蒙古族传统射箭运动的发展状况,卫拉特蒙古族传统射箭运动可采用“三个组织一个核心”、“三项任务一套制度”的传承保护模式。

“三个组织一个核心”:构建文化研究所、文化公司、文化协会三个组织,形成三角发展模式,互为支持,相互促进,并由三个组织的负责人及政府文化部门负责人共同组建弓箭文化保护委员会,作为文化保护事业的核心,制定保护计划,分配活动经费,宏观调控三个组织的活动,具有最高决定权。

“三项任务一套制度”:第一项任务是科研方面建立一定的弓箭文化研究规模,以研究引导产业发展和文化活动,保证文化的传统性。第二项任务是产业经营方面以“以商养文、以文促商”的思路走文化产业发展道路。第三项任务是文化活动方面恢复民族传统射箭训练、比赛、表演等内容,推广传统射艺“育射于教”的文化教育事业。并根据时代特点形成系统的培训制、段位制,使传统文化适应当代发展,规范文化发展模式。

以研究所的形式建立传统弓箭文化研究的平台。研究所为文化公司和文化协会的传承提供技术支持和智力支持,其职能有:

(1)组织相关研究人员和文化爱好者构成研究组织成员,制定相关组织章程、制度、计划,保证具体保护工作的严谨性。

(2)建立文化资料库,完善文化研究电子网络,对弓箭制造、古籍档案、实物资料进行系统挖掘、研究和保存。

(3)制定传统比赛规则、文化培训教材、裁判员认证体系、射手弓术考级分段等制度。

(4)制定射艺教材,纳入中小学体育德育课程体系,发挥“寓射于教”的文化主题,并通过国家体育总局及教育局向全国推广。

(5)召集国内国际相关人员进行学术文化交流,合作传承各民族传统射箭文化内容。

(6)设计和出版相关学术著作及文化宣传品。

以公司的形式设立传统弓箭文化产业营销体系,文化公司为文化研究所和文化协会提供资金支持。先合作建立后独立建立现代化的传统弓箭制造厂,制造生产种类齐全、不同价格档次的传统弓箭,以“以商养文、以文促商”的思路,保护和发展传统弓箭制作技艺,推动弓箭文化产业面向国际国内市场,创建弓道馆、文化展览馆、产品销售网络等产业体系,走文化产业发展道路。

建立民族传统射艺协会,射艺协会为文化研究和文化公司提供社会支持和信息支持。

(1)组织开展传统训练、比赛、表演等各类活动。

(2)开展三级培训和考级分段等推广工作。

(3)建立一只高水平的民族射艺表演队,在进行民族传统射术技艺表演的同时代表自治县参加诸如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等重大相关文化活动。

(4)在文化公司的组织下,通过以弓道馆为主体的文化场所,展示文化内容,宣传文化精神。

制定相关制度规则,根据时代特点恢复传统民族射箭训练和比赛内容,设立三级培训制度和考级分段制度,规范文化发展模式。

三级培训:

(1)在各乡镇文化站建立初级培训点,面向大众传授基本传统射箭礼仪规则和基本射术技艺。

(2)在县中学、体校建立中级培训点,系统传授全面的民族弓箭文化及射术礼仪。

(3)在自治州运动学校设立高级培训点,由协会和体育局联合进行传统比赛裁判员认证、运动员弓术考级分段。

考级分段制度:

根据传统射艺突出道德修养的特点,并参照围棋、跆拳道等项目段位制设立技艺段位制和名誉段位制。

(1)技艺段位制——根据对射手射术技艺的高低和遵循射术礼仪的程度设立一级至五级的技艺段位制。

(2)名誉段位制——根据对于推动传统弓箭文化发展与为“育射于教”文化主题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的个人设立六级至九级的名誉段位制。

历史往往证实这一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盛源于文化的兴起和民族拼搏精神的勃发,民族文化孕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改造和推动民族的蓬勃发展。曾经有众多的文化人类学家在分析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原因时指出:日本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是它的文化和精神,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和继承造就了适合于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变的近代“工业精神”。今日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不仅表现在经济、军事领域,更表现在文化方面,许多霸权主义国家通过其强势文化的渗透和侵略来实现经济和军事力量所不能达到的目标。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来讲,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除雄厚的物质文明外还要依靠各民族所共同缔造的优秀文化成果,维系各民族深厚的感情,保持良好的民族关系,缔造各族人民共同的自豪感、自信心,以先进和繁荣的民族文化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这对于整个中华民族长远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奥其]

the two letters Torguud Kindom's eldest son Shakeduerzhabu to Astrakhan's military governor is not much, not long. But it's the earliest, the most precious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Tod Scripts that records Tulichen Envoys. It has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on researching the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Qing Dynasty with Torghut Khanate.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al Qaeda, explanatory note, Chinese translation, applies linguistics, philology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s, uses Chinese, Russian archives, and Chinese, foreign literature. On these basis, the author has carried a useful study on the two letters and relevant historical facts, place names, person names.

**On Lama's Meeting Ceremony in Qing Dynasty ..... Li Zhiguo(054)**

In order to get to Mongolia—centered vassal states' support, the Qing rulers constantly adjusted the norm that lama's meeting ceremony according to actual situatio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imperial court gave lamas very high etiquette norm. In the mid qing dynasty, the norm is relatively lower. By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imperial court completely turned lamas into vassal states' officials. Through meeting ceremony, the imperial court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centripetal force of vassal states, and conscious gradually increased central government's etiquette, strengthened the unified political situation.

**Lea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y Traditional Culture — With Mongolian Nationality as an Example ..... Baoyinda(059)**

Ethnic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Lea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y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issue of social significance. Ethnic traditional culture's modernization needs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ethnic traditional culture's value,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Namely, ethnic traditional culture's modernization needs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s diversity and identity, traditional and modern relation, foreign culture and native culture. We then explore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way of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We can inherit national culture's essence, develop and utilize excellent culture heritage, then build a multi—level and pluralistic new culture. In this way, we can serv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riat Mongolian's Archery Sport and its Passing.Preservation ..... Fenghui(064)**

Oriat Mongolian's archery sport and its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rich content, and high humanistic spirit. It constitutes the Oriat Mongolian's spiritual pillar of overcoming difficulties and stubborn fight. It has a great influence for national culture's development. Until today, min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culture has the positive influence to Oriat Mongolian culture's development. The paper system elaborates Oriat Mongolian archery movemen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ont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ion of heritage protection mode In view of its current extinct—situation.

**A Textual Research into the Origin and the Evolution of Mongols' Banner of "a Horse in the Wind" ..... FAN Yong—zhen OU Jun(071)**

Abstract: In the paper, on the basis of systematically reading historic classics and documents [mainly in the four such periods as the Great Mongolia (1206—1259) the Northern Yuan Dynasty (1279—1402), the Qing Dynasty(1636—1912)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and carrying out textual researches and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s among Mongolian scholars and herds-men, it is thought that the Banner of "a Horse in the Wind"(or the Banner of "Sacrifice and Praying") takes its origin from the picture The Totem of the Celestial Horse existing in the ancient Shamanism universally believed in by the northern nomadic nationalities, which, taking its source in the worship of animals like horses in Shamanism—a religious mascot symbolizing good luck universally believed in by Mongols in their real life, has a remote ancient history of evolution and inheritance. The earliest pattern of the picture with a shape of a banner was embodied by a white fine steed (holding its head high and galloping quickly) being portrayed or embroidered on a blue piece